

名家

书札

文坛

5

风云

徐庆全 著

一封书信揭秘一段文坛往事
一段往事隐藏无限名家情怀

中国文史出版社

以谈，你心，给之，信已，见，你，好，才，能，怕，来，还是，该，求，调，来，
 此，年，工，作，好，因，可，以，多，学，习，三，如，见，面，时，她，定，会，不，少，鼓，励，与，帮，助，也。你，这，次，
 来，给，了，我，挺，大，信，心，即，对，于，国，家，未，来，的，识，在，一，个，新，的，领，导，方，式，前，
 展，中，必，然，能，克，服，一，切，困，难，逐，步，完，成。我，对，于，你，和，相，同，知，识，青，年，
 占，其，他，这，些，工，作，人，员，表，示，的，前，景，并，不，因，为，个，人，过，去，的，成，就，偏，见，而，减，
 少。愿，望，你，们，如，之，信，下，去，且，希，望，就，康，长，大，一，点，时，也，能，如，你，们，一，样，

怕，一，如，不，给，国，家。我，因，过，去，生，命，
 受，伤，被，送，个，人，押，犯，方，式，中，战，胜，国，
 种，自，由，战，胜，神，加，强，最，后，和，弱，主，即，
 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以，因，家，
 事，即，作，美，术，史，研，究，也，必，然，有，些，
 该，来，者，方，便。但，为，某，工，作，和，时，代，

名家

书札

5

文坛

风云

徐庆全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徐庆全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034 - 2426 - 7

I. 名… II. 徐… III. ①名人—书信集—中国—现代②文学史—史料—中国—当代 IV. K820.7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557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凯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27.75 字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1948年：“一本书是会包含许多缺点的”——丁玲与周扬矛盾的开始 / 1

丁玲的信发自刚解放的哈尔滨，信中谈到了两件事：一是东北文化界正在开展的对萧军和《生活报》的批判；一是关于自己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

1949年：难以超越的自我——赵树理的迷惑 / 13

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转折时期，赵树理谈到了在解放区的体会，谈到了解放后自己的去向。

1949年：生存还是毁灭？——大变革前夜的沈从文 / 27

在被郭沫若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后，沈从文处于迷乱和崩毁状态。在给张以璜的信中，谈到了大变革前夜的种种。沈从文的这种心态，引起陈沂和周扬的关注。

1950年：张光年无法说出的隐情 / 44

《黄河大合唱》的作者、著名文艺理论家张光年，与文艺界巨头周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在新时期，相同的观点使两人惺惺相惜，关系走得更近一些。追溯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张光年的人生历程，1950年周扬将张光年调到文化部艺术局担任副局长一事无法忽略。现今留下一封信谈到了这次调动的情况。

1952年：天真的书生——文艺整风中的夏衍 / 48

波及全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的文艺界整风，作为领导人如何把握政策使运动既不过火而又顺利进行？华东局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向周扬汇报了上海文艺界的情况。

1952年：胡风的惶恐与愤怒 / 64

1952年6月，《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发了舒芜批判胡风的文章，在上海的胡风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当即致信周扬，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愤怒。

1953年：常香玉为丈夫上书周扬 / 73

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与丈夫陈献章的爱情，给后人留下了动人的故事。但在当年，常香玉却因为与陈献章的结合而遇到了一些“政治麻烦”。因为陈献章的身份，她无法与其一同赴朝鲜慰问演出。为此，她给周扬写上了一封表达心迹的信。

1953年：耿庸以书获罪——批判胡风的前奏之一 / 79

1953年的批判胡风运动，其实在1953年已是青萍之末。上海为了跟上全国的形势，决定对“胡风派”的耿庸进行批判。夏衍在信中向周扬讲述了批判的来由。

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 89

“两个小人物”的文章由于毛泽东的批示而演变成批判运动，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俞平伯老先生不免惶惑，他连续给周扬写了三封信，请教如何可以检讨过关。

1955年：被毛泽东否定的编者按——康濯为胡风《我的自我批判》
所写的按语 / 116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所写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时,毛泽东加了编者按。其实,在此之前,这两篇文章本拟在《文艺报》发表,《文艺报》的负责人康濯曾写过一个按语被毛泽东否定。康濯及当年的当事人都想找到这个按语而未果……

1955年：历史扭曲了人格——聂绀弩揭发胡风 / 121

被誉为“论武略可以为将,论文才可以为相”的聂绀弩,一生经历坎坷且有许多传奇色彩。而他与胡风的关系,则是其传奇色彩中浓重的一笔。在将胡风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布后,尚在旅次的聂绀弩给周扬写下了这封“揭发信”。

1956年：“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前因后果 / 134

在前一年被戴上“反党小集团”帽子的丁玲,对自己的处境无可奈何。刘白羽等作协领导对此怎么看?适逢作协理事会的召开,丁玲给刘白羽写下了一封试探性的信。

1957年：《诗刊》创刊前后的故事 / 153

1957年《诗刊》的创刊,因把毛泽东列为作者,出现街头排队购买《诗刊》的景观。臧克家的两封信道出《诗刊》创刊前后的故事。

1959年：齐燕铭关于古籍整理的两封信 / 160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留下了浩瀚的典籍。新中国建立后，本应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整理，但限于开国后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少量的典籍整理出版外，这项工作并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这种局面直到1958年才得以改变。这得益于齐燕铭的倡议。

1960年：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 / 168

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相关档案材料和当事人信函，解密了这段有名的公案。

1962年：戴罪的感激——“摘帽右派”陈学昭的心情 / 178

著名作家陈学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给省委提了意见而被“扩大化”成为文艺界著名的右派。在周扬的关注下，1962年的除夕，陈学昭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她在给周扬的信中，谈到了摘帽后的感慨。粉碎“四人帮”后，她与周扬的来往信件表明，周扬对她的平反问题是大力支持的。

1962年：叶圣陶、郭绍虞关于培养中文专业人才的信 / 188

近年来国学似乎变得非常时髦。可是，什么是国学？国学院应该怎样培养国学人才？诸如此类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四十多年前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郭绍虞关于成立中文专修班致叶圣陶的信件，则实际上是关于培养国学人才的一份详细计划，对解答上述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63年：“知无不言”的代价——贺绿汀提出“大跃进”“四大罪状”之后 / 196

以《游击队之歌》而闻名全国的老音乐家贺绿汀，因为坦率地批评了“大跃进”的一些缺点而被上海市委领导人点名，贺想不通，上书陈丕显，为自己的言论辩解。

1963年：翦伯赞关于《李秀成自述》的一封信 / 207

关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本是一场从学术出发的争论，却因当时反修防修大背景为政治投机者所利用而上升到政治。身处当时历史漩涡的翦伯赞，信中对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引起的连锁反应表示了困惑。

1964年：陈望道催问《辞海》审定 / 219

一部工具书《辞海》的修订，也与当年的政治气候相关联。作为主编的陈望道，很希望中宣部拿出具体的审定意见，但中宣部却迟迟没有下文。这一封信中，陈望道以委婉的语气向周扬表达了催促的意思。

1966 年：“活下去有什么意思”——胡风的彻底失望 / 222

胡风自 1955 年被关押后，直到 1965 年才被判刑，他本想在北平度过余生，却被赶往四川。于是他向本是老朋友的乔冠华写信，隐晦地表达请求帮忙的意愿。乔冠华致信周扬等人并附胡风信，表达自己的意见。

1976 年：周扬为“两个口号”中央论争向上书 / 231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黑线头号人物”“批倒批臭”的周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命运依然没有多少改变。为了摆脱被继续批判的困境，他理智地涌起了向中央上书的念头。

1978 年：王蒙对周扬的感激 / 244

著名作家王蒙的成长，与周扬的关注分不开。正因如此，当周扬第一次出现在国庆招待会那浩浩荡荡的名单上后，远在新疆的王蒙给周扬写下了这封表达问候的信。

1978 年：夏征农关于“两个口号”的一封信 / 249

在粉碎“四人帮”后真理与谬误的较量中，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和方兴未艾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前一个问题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先声；而后一个问题则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夏征农在给周扬的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汇报了上海的情况。

1978 年：陈荒煤呼唤“阿诗玛，你在哪里？” / 259

在《五朵金花》中那个漂亮的、纯真的，像彩云一样美丽的人——杨丽坤，来自被层层丘陵环绕的彩云之下的云南，她那双透明的双眼向观众解释着苍山、洱海边的蝴蝶泉，同时也向观众鸣唱着《阿诗玛》的悲剧。《阿诗玛》在拍摄完成后，即被康生和江青以宣扬“恋爱至上”的罪名打入冷宫。1978 年 9 月，陈荒煤的《阿诗玛，你在哪里？》呼唤，使杨丽坤和《阿诗玛》回到了观众中间，但陈荒煤却因此不得不为这一呼唤作出解释——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回春季节。

1979 年：关于搜寻陈寅恪遗稿的三封信 / 273

在“文革”中遭受折磨而告别人世的著名学者陈寅恪，他的两重要的未刊稿《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晚年的诗稿也不知下落。受恩师嘱托为其整理遗稿的蒋天枢，向习仲勋和周扬分别上书，以求官方干预此事；而著名学者王元化也从旁协助，引出了关于陈寅恪身后的一段故事，留下了一段学术佳话。

1979 年：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 / 284

臧克家的《忆向阳》是 1978 年 3 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之所以有“忆向阳”的定名，是因为诗写的是臧克家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三年劳动的感受。诗集能出版，出版后还先得到好评，稍后又得到如臧克家在给周扬信中所提到的结果：姚雪垠给予不留情面的批判。这一过程本身，折射出“文革”后政治转型期间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

1979年：“相逢一笑泯恩仇”——周扬与冯雪峰的恩恩怨怨 / 300

周扬与冯雪峰，两位文化界巨擘，因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的争论而结怨，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文革”后期，“相逢一笑泯恩仇”。周扬与楼适夷的通信，谈到了两人之间恩怨的化解。

1979年：关于周扬为起草四次文代会报告的提纲 / 318

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以来文艺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刚刚复出的文艺界巨头周扬，承担起了以总结三十年历史经验，推动新时期文艺发展的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周扬对报告的框架最初是如何思考的？这份不经意发现的提纲回答了这一切。

1979年：攻击鲁迅的杜荃浮出水面——关于《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 / 325

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编辑过程中，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是：对于已经有考证结果的一条注释——“杜荃”即“郭沫若”，是否加以注释？此事惊动了林默涵、周扬、胡乔木，并引出了20世纪30年代文艺老战士李一氓的一番感慨。几封来往的信件和批示，记录了这一历史。

1979年：胡乔木、邓力群、周扬与“二为”口号的确立 / 340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就是将过去长期奉为主臬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不科学的命题摒弃，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以往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这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在文艺上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反映，是文艺战线历史转折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过程中，胡乔木、邓力群的倡议之功不可没。这封在审阅四次文代会报告后给胡耀邦的信中，就提出了最初的设想。

1979年：文坛回春的标本——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尖锐意见 / 347

为了使周扬主持起草的四次文代会报告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提议，从草稿开始，就广泛地征求文艺、思想理论界有关人士的意见。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上海市和辽宁省，对这份报告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这两份意见书也为解读文坛回春的历史留下了标本。

1979年：邓颖超的两条意见 / 355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是文艺界人士的知心人。周恩来与世长辞后，邓颖超依然关注着文艺界。在审阅四次文代会报告时，邓颖超想起了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竺水招。这封信引出了周恩来关注竺水招的一段动人故事。

1979年：关于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会议 / 358

为了保证四次文代会的顺利召开，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惯例，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即10月29日下午，周扬为组长的四次文代会筹备小组，召集参加这次大会的党员开会，并请这次大会的总设计师、时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来讲话。偶然发现的一盒录音带记录了这次会议的经过。

1979年：从冲突到握手——陈企霞与周扬的是非恩怨 / 368

1955年的“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及1957年的反右派，使陈企霞成为全国知名的文艺界大右派，而当时的直接主持者是周扬。新时期以来，两人“相逢一笑泯恩仇”。陈企霞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给周扬写信，周扬热心地关注。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风波及其背后——从两封未刊信说起 / 375

《乔厂长上任记》是当年的天津工人业余作家、现今的著名作家蒋子龙的成名作。小说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作者蒋子龙在北京得到了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文艺掌门人”的赞誉，但在天津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得到了“十四块版的批评文章”，几乎令其陷入绝境。一篇短篇小说何以让作者这样“运交华盖”却“已碰头”？两封信揭示了真相。

1980年：胡乔木为周扬修改讲话稿 / 390

胡乔木被称为“中共一支笔”，不仅起草了大量的中共文件，而且，中共党内一些人的文稿也常常交给他审阅修改。周扬在“鲁迅研究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话稿也照例送给胡乔木。胡乔木所做的修改，不但体现了他的风格，而且透露出《鲁迅全集》编辑过程中的一段往事和他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

1981年：从“歌德”到“缺德”——两场文艺风波与胡耀邦的一条批示 / 395

在中宣部部长任上的胡耀邦，一直倡导“三不主义”。河北兵营里的秀才李剑的两场风波，因胡耀邦的批示而平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伤痕文学”的争论。

1981年：陈荒煤和林默涵的一场笔墨“官司” / 405

伴随着对新时期以来文艺界形势的理解的分歧，文艺界领导之间的争论也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人所知。观点的分歧往往从一件小事上表现出来。就报纸误报的陈荒

煤为“文联副主席”的消息,林默涵感觉到文联的民主作风问题,而陈荒煤则为这件小事致信贺敬之要求澄清,形成了一场不起眼的文坛小小“官司”。

1982 年:胡乔木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 / 415

中国现代文学馆自巴金首次提出倡议,胡乔木就是最热心的支持者;在给作协的信中,多次提到这一工程的筹备。在这封信中,为这一工程的选址,胡乔木认为潭柘寺是理想的场所。

1982 年:王元化关于韦卓民遗著的一封信 / 424

戴上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王元化身处逆境,得到了著名哲学家韦卓民的指教。王元化须臾未曾忘记这位父执兼师长的前辈。在月朗天霁的 1982 年,为了表示对韦卓民的怀念之情,他为韦卓民遗著的出版上书周扬。

后 记 / 427

1948年

“一本书是会包含许多缺点的” ——丁玲与周扬矛盾的开始

1948年7月，著名作家丁玲从河北出发，取道哈尔滨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代表会议。在哈尔滨等待启程时，对新解放区的文艺情况做了一些了解，写信向正在华北的胡乔木（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周扬（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作了汇报。在这封信中，丁玲主要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东北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对萧军的批判，另外一个她是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略作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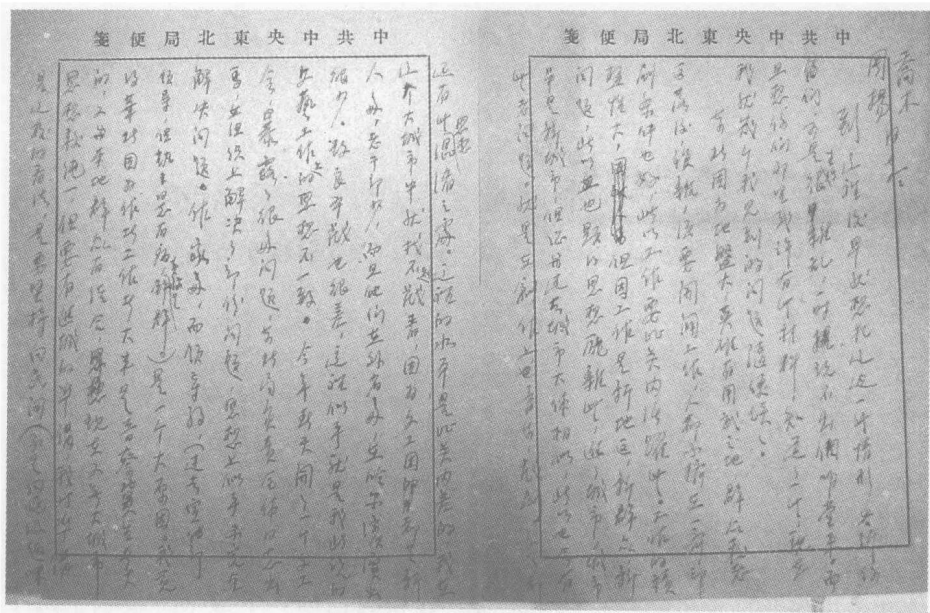
丁玲给胡乔木、周扬的信

乔木、周扬同志：

到这里后早就想把这边一些情形告诉你们，可是生活很杂乱，一时说不出个明【名】堂来。而且想你们那里或许有些材料，知道了一些，现在我就几个我见到的问题随便谈谈。

东北因为地盘大，英雄有用武之地，群众较老区落后，复杂，须【需】要开辟工作，人都不挤在一齐【起】，印刷条件也好，所以工作要比关内活跃些。工作的积极性大，但因工作是新地区，新群众，新问题，所以也显得思想庞杂些，进了城市，城市虽是新城市，但证【正】与过去城市大体相似，所以也会有些老问题。就是在创作上，音乐，戏剧，文学都还有些思想混淆之处。这里的水平是比关内差的，我在这个大城市中就找不到戏看，因为文工团都是新人多，老干部少，而且他们在外省多，在哈尔滨演出很少。改良平戏也很差，这里似乎就是我所说的文艺工作上的思想不一致。今年春天开了一个文工会，暴露了很多问题，东北局负责全体





同志出马，在组织上解决了部分问题，思想上似乎未完全解决问题。作家多，而领导弱，（过去宣传部领导，但凯丰同志有病，实际是舒群。）是一个大原因。我觉得华北因为作者【疑为家】工作者大半是晋察冀生长大的，又与本地群众有结合，现在又无大城市，思想较统一，但要有进城的准备，我对准备是这样的看法，是要坚持向民间（不是向低级趣味）好些。另外就是关于肖【萧】军，肖【萧】军在东北闹了很多麻烦，刚回来时太棒了，衣锦还乡（肖【萧】本人当然还觉不够）给了他文学院，鲁迅出版社，文化报，鲁迅研究会，给了农场，印刷，五六个生产机关。后来他因闹恋爱（不是强奸）就处分了他，逐出哈尔滨等又太厉害了，结果他要求回来，又答应他了，职务还是他的，于是就更胡说八道了。党便决定出一生活报，与其斗争，团结工作只做到给他东西，未给他帮助，也不检查他工作，审查他用的干部，而文艺人谁也不理他，却又花分【费】让他办报骂我们。现在是开了火了，还是开头呢。这次总想搞个结果出来。东北局有负责同志也说太不像话了，要斗争。现在我寄两份给你看看。我们开始也很不策略，我们同志写文章都只会写给自己看，不会写给读者，写给肖【萧】军的读者看，我们的说服人的办法少，理论不够是事实。但肖【萧】军问题是可以教育我们和很多读者的。肖【萧】军以外的高长虹无声无息，塞克在文艺圈子中不得志，没有一小小地盘，做教育所副厅长去

了。我在这里一月多，时间割裂开了，蔡大姐要我写小册子，搞材料，占了一些时间，文委那里也跑跑，占了一些时间，既没有如我想像的写几个月文章，也没有如我希望的到一个工厂去住两个月。因此我觉得明年回国后花些时间写文章去住工厂都好，不愿意长途跋涉，因此就懒得回来了。但晋察冀在我感情上我是舍不得离开的，但既离开了，就过一时再说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已经离这样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乔木同志向来对我不客气，肯直说，我也很欢迎你给我些意见，一本书是会包涵【含】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一定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东北改行的已不少，现在有改行思想的也不少。这里面是有许多问题的。谁愿意老干这个行当，别行也不是就不能做。很多人都有这种牢骚）。

华北情形你们可以叫人寄我些书报，使我知道一些，这里也还可以介绍出来。

敬礼！

丁玲 九月十九日

东北局对萧军的批判

1948年8月，与东北军事战场大决战前夕的沉寂状态相比，东北文坛上却掀起了一场大论战。《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著名作家萧军主编的《文化报》与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之间，为《文化报》8月15日的一篇社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而这场论争，是东北局以官方身份对萧军的一系列言论的清算的开始。所以丁玲在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中说，“现在是开了火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日寇铁蹄下蹂躏14年的东北地区光复了。9月下旬，萧军回到了离别12年的故乡——哈尔滨。

“衣锦还乡”的萧军——正如丁玲信中所言，在那时确实是相当风光的：他的描写抗日题材的《八月的乡村》，早已在全国走红，而鲁迅的学生和来自延安的老干部等头衔和身份，则使东北的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这位本乡本土的著名作家多少带一些敬仰之情；而此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也正需要知识分子来大力宣传党的政策。诸种因素融合在一起，就有了丁玲所说的萧军刚回来“太棒了”的情况：萧军回到哈尔滨时，当地举行了各界欢迎萧军先生的大会——这样的荣誉，在哈尔滨大约只给过